

编号 000201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工业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摘编

(初 稿)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秘书组、宣传组编

一九七七年二月

编 者 按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遵照华主席的指示，为了深揭狠批“四人帮”在工业方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摘编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这方面的谬论，供工交系统各单位批判。

这个摘编（初稿），收集的材料很不全，分类也可能不准确，请各单位在使用时收集新的材料，提出意见，以便补充修改。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秘书组、宣传组

一九七七年二月

目 录

一、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 | | |
|-------------------------------------|---|
| 1、鼓吹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 1 |
|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 2 |
| 3、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作“革命”对象..... | 3 |
| 4、反对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 | 4 |
| 5、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搞资产阶级特权..... | 5 |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 | |
|---|----|
| 1、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 6 |
| 2、反对实现多快好省..... | 7 |
| 3、反对中央集中领导，大搞独立王国..... | 8 |
| 4、歪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大搞崇洋媚外..... | 11 |

三、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 | | |
|-------------------|----|
| 1、歪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 | 14 |
|-------------------|----|

2、鼓吹生产“自然上去”论.....	15
3、反对大干社会主义，诋毁“四个现代化”	16
4、煽动停工停产.....	17

四、对抗“鞍钢宪法”，反对工业学大庆

1、鼓吹以“三讲”代替“鞍钢宪法”	19
2、恶毒攻击大庆，妄图以所谓“上海经验”代替大庆.....	20
3、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22
4、反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25

五、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1、污蔑攻击工人阶级.....	26
2、鼓吹依靠闹派性、搞武斗的人，煽动无政府主义.....	28
3、反对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队伍.....	29
4、反对关心群众生活.....	30

六、反对党的领导

1、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妄图用群众组织代替党.....	30
2、宣扬结“帮”营私，结“帮”篡党.....	32
3、反对整党整风.....	35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工业方面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摘编

(初 稿)

一、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1、鼓吹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军队一次讨论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会议上，张春桥大谈反经验主义问题。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反对经验主义“有现实意义”，公然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来解决军队存在的各种问题。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批判文章)

早在一九七一年，张春桥就说：“党内思想问题，文化大革命解决了一些，任务是很重的，党内情况是这样，当前主要倾向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在上海市第四届党代会上
作的政治报告)

江青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迟群传达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给新华印刷

厂的电话“指示”)

江青说：“我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四年四月四日在染印法电影技术攻关会议上的讲话)

黄涛说：“我们决不能做一个‘工作上辛辛苦苦，路线上糊里糊涂’的好人，我们一定要克服经验主义这个主要危险，……”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市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2、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早在一九五五年，张春桥就说：“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还有什么人呢？帝国主义被赶跑了，官僚资本主义被打倒了，封建地主正在改造成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正在改造成为工人，知识分子经过八年的自我改造，他们的多数正在为劳动人民服务。”

(摘自一九五五年四月张春桥黑文：《坚持工农兵方向》)

姚文元说：“这一次对丁、陈（指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揭露，可以说是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路线的最后终结……”

(摘自一九五八年姚文元的黑文：《冯雪峰资产

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

张春桥说：“阶级斗争不抓也灵。”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文汇报》批判文章)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的一次谈话)

3、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作“革命”对象

“四人帮”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
“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天津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篡改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把工厂企业领导干部的状况说得一团漆黑。他说：“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副书记，里面成份很复杂，有的原来是资本家，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叛徒，有的原是共产党，后是走资派。”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在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又说：“有些人问题不大，工作也做不好，也不好处理，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人搞下去，是个好机会。”

(摘自马天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我的揭发

(交代))

张春桥说：“对解放出来的干部，要当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待。要搞一个巴黎公社，彻底砸烂‘旧机器’”。

(上海市委组织组的揭发材料)

“四人帮”要大写所谓“各种各样的走资派”，什么“勤勤恳恳抓生产的走资派”，“挺着肚子，有事业心的走资派”，什么“不是叛徒、特务而是牌子很硬的老革命的走资派”，“没有个人品质错误，清清白白的走资派”，等等，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

(转摘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文汇报》批判文章)

马天水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从中央各部到省市地方，掌权的大部分是民主派。”

(上海市委组织组王日初揭发交代)

王秀珍叫嚷：现在“要从上到下揪大大小小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在中华船厂的讲话)

4、反对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

张春桥说：“基本路线教育谁知道正确不正确？”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讲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马天水等人说大批资本主

义是“大资产阶级整小资产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一九七五年冬七六年春在上海市几次县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四人帮”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要“整上不整下”，“要搞上头”，“要搞大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污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脱离当前实际”，叫嚷“你们还批资本主义干什么？”

(转摘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批判文章)

王秀珍说：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整顿干部的“刀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的一次发言)

一九七五年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要上海汇报重点企业领导班子的分析情况。黄涛说：第三类企业不要讲“路线不端正”，“我们上海不存在路线不端正的问题”。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七)

5、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搞资产阶级特权

王洪文说：“无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是对立统一，

谁说没有无产阶级法权。”

(一九七五年王秀珍传达王洪文的一次谈话)

王洪文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竟然限制到市委常委头上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材料之九)

江青理发也要人陪她打扑克，她坐的沙发特别矮，理发员只能蹲着甚至跪着给她理发。有一次她还恬不知耻地问理发员：“你看我算不算资产阶级法权啊？”“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不算资产阶级法权。”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日报》批判文章)

陈阿大说：“货币对我们这些人不起作用。”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材料之九)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但一九六九年张春桥恶毒攻击说：“《论十大关系》完全是苏联的一套，无

非是企业管理，物质刺激。”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王知常揭发交代)

2、反对实现多快好省

在讨论发展上海钢铁生产时，张春桥说：“我早就讲过了，不要怕降低速度，下降也可以。”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周总理指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姚文元却说：“质量问题是个领导问题，团结问题，政策问题。”有意偷换概念，反对抓质量。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经济组揭发)

陈阿大说：“抓企业管理从质量入手，势必造成纪律约束。”

(上海良工阀门厂揭发)

“四人帮”胡说：“利润越低越好，大家都姓公，核算有啥用。”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贵州日报》批判文章)

马天水胡说：“成本核算哪能那么细，倒轧账也可以。”

(上海市财政局揭发)

在建设金山石油化工总厂时，黄涛说：“多花一点钱没关系”，“我就是要大、洋、全”。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揭发)

陈阿大鼓吹住宅建筑标准高了还要高，他说：“要搞中华牌加过滤嘴的标准”。还胡说：“就怕你们（指设计人员）设计不出来，不要怕造不出来，钱有的是。”

(上海市设计党委揭发)

一九七五年马天水在一次讲话中说：要求全面完成产量、品种、质量、消耗、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凭我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转摘自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七)

3、反对中央集中领导，大搞独立王国

王洪文说：“我们上海要独立自主地搞，蹩着一肚子气搞，不靠他们（指中央有关部门），我们一样能搞上去。”

(转摘自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批判文章)

一九七五年中央九号文件下达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说：“九号文件是搞复旧”，“上海和外地不一样”。马天

水对铁路局党委负责同志还说：“你们不要拿九号文件压我。”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
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二)

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务院草拟了一份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工作的文件。马天水竟说：“这是老一套，老框框，搞管卡压”，拒绝讨论，把文件退了回去。会后，国务院把这一文件批给各省市区试行，马天水又蛮横地批示“不翻印”，“不转发”。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
之十四)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马天水说：“全国配套的观点就是‘条条专政’的观点。”

(上海机床厂揭发)

一九七三年周总理指示成立造船统筹组，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一个规划，黄涛看后说：“统筹统筹，统而不筹，统筹为时过早。”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
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七)

当物资部门反映上海超过中央批准的计划私自安排炮弹生产时，马天水说：“什么中央、地方，都是国家计划。”

(一九七五年一次汇报会上的插话)

当谈到劳动指标超过国家规定时，马天水说：“不要管他，你们劳动局是哪家的，是听市委的，还是听国家劳动总局的？”

(上海市劳动局揭发)

四届人大期间，马天水说：“他（指国务院领导同志）是来谈在全国组织经济协作区问题的，他要我带个头，先在华东搞起来，我是不干，搞起来，几个省都向你上海要东西，你给不给？”陈阿大说：“这是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干。”

(上海市总工会揭发)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陈阿大对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领导大加指责：“谁叫你们搞重型车的？”“他妈的，国家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你能满足得了吗？……我的意见，重型汽车就是不搞！”

(上海市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揭发)

马天水说：“指标过头了，今年财政任务就是不承认。”

(一九七六年五月在上海市财政局汇报会上的讲话)

黄涛说：“投资给的少，就是要争……，春桥××讲了，争了不给也没关系，我把上海财政收入扣下百分之十，看他们怎么办？”

(一九七五年十月计划会议期间的一次讲话)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黄涛对石化总厂指挥部的同志说：“金山是上海的金山，金山工程是上海的金山工程，你们要听上海的，不要听北京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一)

陈阿大说：“吃上海的饭，就要给上海做事，不干地方的事，不给饭吃。”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二)

4、歪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大搞崇洋媚外

“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把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污蔑为“步清朝洋务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后尘”、“拜倒在洋人脚下”、“充当帝国主义的附庸”。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日《光明日报》批判文章)

江青明明知道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却要追查“大化肥究竟是谁批准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

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一)

黄涛等攻击毛主席亲自批准进口的十三套大型化肥设备是“奴化思想大回潮”，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是“拜倒在洋人脚下，没有中华民族的骨气，没有无产阶级的气味”。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

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一)

一讲到出口，“四人帮”就说是“投降卖国”。近几年来，毛主席亲自圈阅同意“努力增加原油等工矿产品出口”。但“四人帮”以批邓为名，大批所谓出卖“国家资源”。姚文元污蔑国务院把资源“租让给外国”，搞卖国主义。江青胡说“我国出口石油把国际能源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得罪了第三世界，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

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

之十五)

“四人帮”把正当的进出口贸易污蔑为崇洋媚外，其实他们自己才是大搞崇洋媚外。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去国外拍一部新闻纪录片，张春桥批准进口十二万美元的电影摄影设备，连电线、话筒也要买外国的，有关部门的工人同志对他们到国外拍电影不用国产设备，很有意见，但他

们根本听不进，以势压人，说什么：“国产的不可靠，出了故障谁负责？”

(转摘自国家计委揭发材料)

“四人帮”有个规定：凡是拍他们的所谓重点影片的时候，如《欢腾的小凉河》、《盛大的节日》等，一律要用美国伊斯曼胶片。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五)

王洪文坐的汽车喇叭坏了，指定要从西德进口，并说：“西德的喇叭声音好，听起来舒服。”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五)

江青说：“看国产影片很吃力，要冒大汗。”西方电影“看了轻松，能使我转移思想。演员演技高，音乐太富于想象力，”“这种音乐听了可以开胃口。”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报》批判文章)

江青说：民族乐器都有“音准问题”，“粗糙刺耳”，西洋乐器“科学”，“技术上发展”，“表现力丰富”，“法国号……吹民歌，老乡就喜欢听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解放日报》批判文章)

陈阿大说：“我就是宁愿坐伏尔加，也不要坐上海牌轿车。”

(上海市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揭发)

三、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1、歪曲革命和生产的关系

张春桥说：“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物质我就不管了。”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对马、徐、王的谈话)

“四人帮”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不出一架飞机，也是形势大好”。

(转摘自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批判文章)

马天水在研究大屯煤矿工作的一次会上说：“只要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大会。”

(上海勘察院揭发)

马天水一九七一年后多次对上海机床厂干部说：“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完不成任务也是伟大的胜利。”又说：“生产上去了，路线不对头，要批评。只要路线对头，即使生产上不去，也要表扬。”

(上海机床厂揭发)

2、鼓吹生产“自然上去”论

王洪文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张春桥说：“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地上去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马天水说：“上海的钢铁生产是靠批唯生产力论上去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3、反对大干社会主义，诋毁“四个现代化”

“四人帮”污蔑大庆工人提出的“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口号是“唯生产力论”。：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胡说：“大干是以目乱纲。”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四人帮”及其走卒叫嚷：“把生产搞上去，是为走资派涂脂抹粉。”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第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四人帮”胡说：确保铁路畅通是“通到资本主义去”。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在河南的亲信说：“大干大修，小干小修，不干不修，坐着反修。”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光明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攻击在本世纪末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说：“希望二〇〇〇年过得更好，二〇〇〇年虽然遥远，也算是一种遥远的安慰吧”！

(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在一封信上的批示)

张春桥攻击四个现代化，“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四人帮”胡说“四个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王秀珍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疯狂攻击说：“什么现代化！？实际是法西斯化！”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王知常揭发交代)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上海机床厂揭发)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一日马天水在上海电表厂说：“赫鲁晓夫一上台也讲斯大林农业没搞上去，我要搞上去。所有机会主义头子都讲搞上去。”

(上海电表厂揭发)

4、煽动停工停产

王洪文说：“搞垮一个厂子，就是在省委书记脖子上套上一条绞索。”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不要怕把生产搞下去，不要怕把形势搞乱，生产下去了，形势乱了，就会把他们（指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打下去。”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广州日报》批判文章)

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有万名职工，江青一个人也不认识，党委书记是谁她也不知道，可是她一到厂，就胡说什么：“那种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你还不罢工，不贴大字报？”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法家造反，儒家生产”，“停工停产闹革命”。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及其走卒胡说：“哪里烟囱冒烟，就往那里冲”，“把生产搞垮，把他们拖住”，“损失是国家的，责任

是当权派的，权力是我们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期《红旗》批判文章)

四、对抗“鞍钢宪法” 反对工业学大庆

1、鼓吹以“三讲”代替“鞍钢宪法”

一九七二年，张春桥、姚文元讲：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讲领导权，讲生产关系。

(上海手表厂揭发)

马天水说：“‘三讲’经验是有针对性的，现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有股复辟倒退的思潮。”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注：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指示要注意加强企业管理，以保证产品质量。张春桥、姚文元窜到上海，鼓吹所谓“三讲”，同周总理唱反调，污蔑周总理抓质量、抓管理是不讲路线。马天水、黄涛、朱永嘉策划在上海两报发表一篇鼓吹“三讲”的社论，并把原稿中坚持“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的提法全部砍掉。

王洪文说：“能否考虑在炼钢厂的企业的管理上搞出我们自己的一整套来……这不仅是你们一个厂问题。”黄涛接着吹

捧说：这是“对冶金战线的巨大鼓舞”，“要乘这个东风。”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上钢五厂的谈话)

王洪文在上棉十七厂把一个车间当作他的点，狂妄地说：要在这里摸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

2、恶毒攻击大庆，妄图以所谓“上海经验”代替大庆

张春桥在一九七四年十月竟说：“大庆是管卡压的典型，是唯生产力论的样板”，“毛主席过去树他们，是创业阶段，现在他们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批条条专政，批唯生产力论。”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把大庆说成是“生产典型”，说大庆工人“论干劲没说的，论觉悟不咋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四人帮”胡说：“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不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要“彻底批判大庆道路”。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什么两论起家，毛主席的论多着哩！”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江青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不符合事实。”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汇报》批判文章)

江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攻击大庆会战时主要领导干部是“刘少奇司令部的黑干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批判文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攻击王进喜同志说：“王铁人也表现的很不好，可能走向他的反面。他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什么革命要求呢？”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黑龙江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工业学大庆，搞亦工亦农，这是共产主义的事，讲它干什么！”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江青指使姚文元说：“不要登大庆、大寨的文章，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登一点也不要放在重要位置上。”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批判文章)

一九七一年十月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学大庆究竟怎么样？这件事我有些怀疑”，“我看大庆人也被人家弄得糊里糊涂”。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王洪文说：“我们要总结上海一套完整经验”。马天水也胡说：“大庆是一个点，上海是一个面。学大庆主要是总结自己的经验”。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黄涛说：“什么学大庆，上海有上海的大庆，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就是大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一)

3、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张春桥、姚文元都说：“我们能不能搞不靠规章制度，而靠政治工作办企业的经验？！”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

张春桥胡说：“毛主席只讲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讲过要建立规章制度。”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谈到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时，张春桥说：“有的是老制度（指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自然科学的就要，有阶级性的就不行了。”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听取五七〇三厂汇报时的插话)

张春桥说：“上海工人绝大多数比较心情舒畅的，没有条例管，工作也可以做。”

(一九七二年十月在上海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说：“合理的规章制度，如用人去管，也就变得不合理了。”

(上海机床厂揭发)

马天水说：“搞科室就是复旧。”

(一九七二年在上海微型轴承厂的讲话)

黄涛说：“机器一转动，就有管理，你们不要去抓。”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揭发)

马天水说：“岗位责任制不能订死，订死了就是倒退，就是助长个人主义，订死了，孔宪凤、雷锋怎么出来呢？制度订得再好，总是有漏洞的，蒋介石的宪法，经过反复推敲的，我们共产党不是抓住他们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的么。”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在上海钟表元件厂的讲话)

马天水说：“关于岗位责任制问题。在生产上，我们工人要管全面，管全国的，管政治上的岗位，不提全国的、政治的岗位，只提小岗位，这是修正主义货色。”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五七〇三厂的讲话)

马天水说：“岗位责任制把人定死了，工厂失火谁去管？”

(在上海手表厂谈话)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当上海锅炉厂汇报该厂准备健全原始记录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时，马天水很不耐烦地说：“不要搞繁琐哲学，统计数字七不离八就可以了。”

(上海锅炉厂揭发)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对党委常委说：“社教就叫管理，没有别的管理。凡是搞什么多少条多少条

的，不管几条都是不对的。”

(上海机床厂揭发)

4、反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按照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刊登了东北辽阳发电厂关于开展劳动竞赛、小指标竞赛的报导。张春桥、姚文元看了非常恼火，胡说“上海对这篇报导意见很大”，要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亲信派记者来上海找黄涛谈话。黄涛攻击这篇报导是宣扬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攻击毛主席有关劳动竞赛的指示已经过时，胡说“那些指示都是很早以前讲的，不能以过去的指示来否定现在的指示嘛！”。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交系统揭发
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一)

“四人帮”攻击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经济领域的右倾翻案风”。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疲劳的是积极分子。”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王知常揭发交代)

一九七五年四月马天水在一次会议上说：“先进班组多了不利，容易引起荣誉，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调动起来，发展资

产阶级。”

(上海机床厂揭发)

一九七六年七月间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说：“搞劳动竞赛，会滋长个人英雄主义。”

(上海机床厂揭发)

五、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1、污蔑攻击工人阶级

一九四七年张春桥在石家庄工作时就说：“党在城市的工作应依靠贫民”。

(上海人民出版社揭发)

张春桥说：“工人阶级未必能依靠的”，“能不能依靠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

(一九五一年九月在《解放日报》的一次谈话)

张春桥说：“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批判文章)

江青说：“我见了工人就头疼。”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批判文章)

江青在天津手表厂参观时说：“我愿意当工人，当农民，不费脑筋，整天劳动。”并恶毒污蔑工人阶级说：“工人本色就是脏！”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天津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有些劳动模范过去受苦，容易满足，现在没有革命要求和远大理想，光知道现在甜呀甜呀。所以，不能老是忆苦思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对“红革会”、“工总司”代表的谈话)

张春桥几次三番要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搞工人队伍的调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次小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朱永嘉说：“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问题不少，他们也是可以分析的，……第一部分是老工人，他们工资高，政治经济地位都是工人中的上层分子。第二部分是解放前后当艺徒的，三反五反当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思想比较保守，受物质刺激的影响很深，物质刺激果实的得益者，对管、卡、压一套也很欣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管理路线，这部分是拥护的，是基础。第三部分是大跃进前后进厂的工人，基本上是学生，工人中的小知识分子。”王知常接着说：“这部分人对党的观念比较淡薄，但是……对文化大革命最有感情，对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很敏感，斗争也最坚决。第四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他们热情单纯，但不大懂事，缺乏斗争经验，幼稚，没有经过锻炼。”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经济组揭发)

朱永嘉说：“民改到五六年一批干部，……其弱点是八级工资制尝到好处的，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是感兴趣的，一长制也搞过，也感到有味道，要有赏有罚。反右后、四清前后出来的干部，……路线觉悟不高，有的当了老保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在学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

2、鼓吹依靠闹派性、搞武斗的人，煽动无政府主义

张春桥说：“一味整无政府主义，群众要有意见。”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王洪文说：“有的单位排无政府主义二十大表现，等于整了群众。”

(上海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揭发)

王洪文说：“闹派性、搞武斗的人，倒有点反潮流的精神，我倒喜欢用这样的人。生产好的人，往往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路线斗争觉悟不高”。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的

(讲话)

有人向张春桥汇报流氓阿飞打群架，张春桥说：“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关于召开上海市第六次团代会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向张春桥汇报个别青工生产时间捉蟋蟀，屡教不改，张春桥说：“不要批评，领导干部应当同他一起去捉蟋蟀，先培养感情，而后再做思想工作。”

(在一次汇报会上的插话)

马天水胡说：“三老四严是提倡奴隶主义。”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四)

3、反对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队伍

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文汇报》批判文章)

陈阿大说：“干部一部分学马列是可以的，号召全厂学马列办得到吗？现在用行政命令、党的命令强制工人学，要走向

反面。”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在上海良工阀门厂的讲话)

陈阿大说：“可以组织工人学习报纸上文章，不能要求所有工人学马列。”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良工阀门厂的讲话)

4、反对关心群众生活

张春桥说：“八亿人民生活苦点没关系。”

(转摘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一期《红旗》批判文章)

江青说：“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在大寨大队接见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张春桥说：“工房不要搞。”

(一九六八年的一次讲话)

黄涛说：“劳逸结合，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口号。……

(现在还这样提)，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一九七三年在看一个外地刊物时的谈话)

六、反对党的领导

1、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妄图用群众组织代替党

王洪文说：“哪里的党组织的机器还在转动，哪里的形势就不好。”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一九六八年底张春桥对市工代会部分委员说，“工会可以发号施令嘛，党组织不执行是错误的。”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六)

王洪文在市总工会成立大会上说：“工会要对党组织起监督作用。”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六)

一九六八年张春桥在上海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党究竟还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

(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王知常揭发交代)

张春桥说：“党委、区委、市委要不要？”“将来要不要支部的名称？建立了支部，车间革委会怎么办？厂要不要党委？”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在上海电子管厂的讲话)

在批林批孔中王秀珍说：“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

(对上海总工会干部的一次讲话)

2、宣扬结“帮”营私，结“帮”篡党

江青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说：“上海一定要搞好，上海是以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一九七五年全国计划会议时对黄涛的谈话)

毛主席多次批评“四人帮”，江青不听，在一九七六年中央打招呼会期间，她对马、徐、王说：“我是上海派，我就是要照样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黄涛交代)

江青说：“不怕人家说我们搞小集团。”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日报》批判文章)

张春桥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公然提出，选人要“领导熟悉，群众拥护，上上下下”。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

(之三)

张春桥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工代会筹备会议上说：“现在你们是工总司委员，过了几年，你们有的可能是市委书记、副书记，有的是中央部长、副部长。”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十六)

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王秀珍在工会干部学习班上对一些“小兄弟”说：“你们在下面好好学习、劳动，今后要我们上海派中央部长、副部长的干部。”

(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揭发)

王洪文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电影电视工业座谈会上说：“上海的电影电视工业一定要搞好，上海搞不好，我在中央怎么说呀，我怎么去管人家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心领神会，紧紧跟上，一再肉麻地说：“我们一定要把上海电影工业搞好，要为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争气。”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上海工交系统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发言材料之五)

王秀珍说：“好好干，为在中央工作的王司令争气。”

(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揭发)

张春桥说：“上海要多选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我本

来不大愿意从上海抽干部，多抽了又要说上海帮，现在感到有需要，就是抽！”

(上海市委组织组王日初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揭发交代)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张春桥说：“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光明日报》批判文章)

王洪文说：“这些老头头（指他的一些“小兄弟”）无论怎么样……到时候对我们是有用的。”王洪文调中央工作时，对王秀珍说：“你以后有事情多找这些老头头商量商量。”

(王秀珍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揭发交代)

王洪文说：有些老头头，“你不要看他们有这样那样缺点，今后如有风吹草动，真的能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的，还是这些人。”

(上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揭发)

王洪文说：“党的十大，小兄弟没有一个进中委，有点摆不平。”

(对王秀珍的一次谈话)

王洪文说：“今后培养干部要通过工会”

(上海沪东造船厂揭发)

王洪文说：“选人要选对工总司有感情的，档案只能作参考，社会关系复杂也不要紧。”

(上海市房地局揭发)

王洪文说：“林彪能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新干部。”

(一九七四年三月同王秀珍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王秀珍说：“我和马老、老徐劝洪文快点回北京去，我们对他说，你在上海久了，不去中央，不去主持工作，让人家主持工作，权被别人掌握了，现在你不回去怎么办？我们内心是希望你在上海多住一个时期，但你再不回去，形势不利，越早点回去越好……”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张敬标揭发)

王秀珍说：“我们提拔新生力量比毛远新那里落后了，毛远新在插队青年中选拔了一批有干劲的人，到有问题的大队里去。”“这些青年自己宣布‘我是支部书记’，‘我当大队长’，不久这些大队的面貌就改变了。”

(王秀珍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同川沙县委领导干部的谈话)

3、反对整党整风

“四人帮”反对整党整风，胡说什么“整党就是复辟”，“软、懒、散没有阶级分析”，“整顿就是整造反派”，“转

移斗争大方向”。

(转摘自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批判文章)

对整党整风，马天水说：“这是老经验，是形而上学。”

(一九七五年底讨论学大寨时的讲话)

王秀珍说：“一整风就把人家搞得灰溜溜的。”

(一九七五年底在一次县委书记会上的讲话)